

辛亥革命的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晚上20:08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6岁。于右任一生创作诗词千余首,题字、题写对联万余副,编制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他和水利专家李仪祉、著名报人张季鸾被誉为“陕西三杰”,是那个时代三秦儿女最优秀的代表。在许多方面,于右任都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

于右任开历史先河的几个创举

■人物春秋

首创我国白话诗作

现代文学史认为,最早见诸我国报刊的现代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2月-6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白话诗四首》和《白话词四首》。此定论不确。史实证明我国最早的白话诗作者,是民国奇才于右任。

1909年5月18日,于右任在自己创办的《民呼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元宝歌》的白话诗:

一个锭,几个命,
民为轻,官为重,
要好同寅,压死百姓,
气得绅士,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于右任的这首白话诗,如同俚语村言,通俗易懂简洁鲜明,寓意深刻。寥寥数行,活脱脱刻画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卑劣行径和丑恶嘴脸,读后痛快淋漓。

首创我国火车夜行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下设九部,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未就职,次长于右任主持部务。

那时,中国的火车,昼行夜停。临时政府成立后,南京和上海两地官员和民众来往人数剧增。沪宁两地相距几百里,单程就需七八个小时。孙中山曾提议火车夜行,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有此意。但因因循守旧,未能实现。于右任在民国元年1月23日正式宣誓就职后,即着手与铁路局方面商谈,决定每夜12时,沪宁对开特别快车一列,所有售票、搭车章程均按特别快车的规定办理。每月费用1.5万元,由交通部负担,盈余交部充公,亏损由部补贴,从2月24日开通夜行火车。从此,大大方便了两地往来。

首创我国报纸募捐

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正式出版的前一年8月,在该报的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当时,地处大西北的甘肃,连年旱灾,一片饥馑,发生了人相食惨状,然而,陕甘总督升允却只知无度挥霍享乐,不顾饥民死活,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仕途,故意隐瞒缩小灾情,欺骗社

会和国人。为揭露升允的丑恶嘴脸,报告甘肃灾荒的真相,《民呼日报》连续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甘督升允开缺感言》等锋利文论。

于右任和同仁,一面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甘肃这些惨不忍睹的社会真相,一面用《民呼日报》呼吁“人饥己饥”,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那段时日,《民呼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甘肃省催人泪下的灾情纪实,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请《民呼日报》社转交。各地的汇款单和救灾物资纷至沓来,竟使报社接不暇。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报社参加募捐救灾。

首创国民党高官救助共产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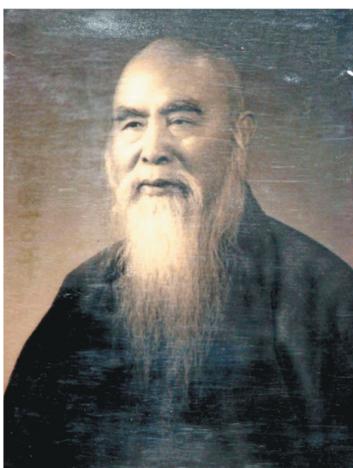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专院校师生集会向段祺瑞执政政府请愿,遭到残酷镇压,47人被枪杀,200多人受伤。陕西三原籍的北大学生、中共党员张仲超被枪杀,陕西籍学子10余人受伤。白色恐怖的北京城里,充满腥风雨雨。于右任原本想设法制止段祺瑞执政政府杀戮学生,而他已经被列入通缉名单,有心无力。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帮助李大钊处理善后事宜,叮嘱有关人员查清死伤的陕西籍学生,为死者治丧,为伤者治疗。他东奔西走,筹借了二三千元,交朱家骅办理。朱家骅害怕奉天和段祺瑞执政政府追捕,携款逃往天津。于右任生气无益,只好又设法和国民二军驻京办事处联系,借到一笔钱,才安置了陕西死伤学生。

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三位死难学生开追悼会时,于右任冒着生命危险出席并讲话,强烈谴责镇压学生的暴行,还敬送一副挽联“烈士之血 主义之花”,表示他对这些年轻革命者的悼念和缅怀。

首创“萝卜司令”称号

1926年底到1927年初,于右任从苏联回国后,任国民联军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提倡体力劳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于右任和冯玉祥等高级将领,打扫街道,清理垃圾。时逢西安解围不久,城内粮食十分欠缺,为了节省粮食,于右任、冯玉祥每顿饭都以萝卜为主要蔬菜,或炒、或熬、或煮、或熘,或切丝生食,经常如此。加上时任陕西省民政厅的厅长,思想激进,憎恶妇女缠脚,曾张贴布告禁止,还把收上来的裹脚布悬挂在民政厅的院子里,以宣传妇女不要缠脚。时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萝卜司令”,下联是“裹脚厅长”。由于于右任和冯玉祥等人的努力,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联军任陕总司令和其所属机构作风清廉,办事高效,一时成为美谈。



首创把儿子婚礼礼金全部用于赈灾

1929年8月,上海,于右任官邸。于右任长子于望德结婚。于右任一反平日办事低调的常态,大事张扬,在一品香大酒楼宴请亲朋好友。不少挚友悄悄议论:“于公这次是怎么啦?”

举行完大婚仪式,宾客纷纷入席,刚刚坐定,于右任招手请大家安定,含泪讲述了陕西的旱灾惨状:“田土龟裂,哀鸿遍野,连年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不少人以观音土充饥;逃荒的日益增多,饿死的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不时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粮价飞涨,米粒如珍珠一般珍贵,原来七八块大洋一石的小麦竟涨到现大洋二十七块!在南京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有人硬说三秦无灾!”于右任悲愤交加,痛哭流涕地说:“我代全陕饥民多次呼吁。然而,拨来的赈灾款少得可怜,偌大一个三原县才给一千多元,杯水车薪啊!我这次为儿子大办婚事,就是要将所接收的礼金全部移作救灾善款。陕西灾民可怜,我代灾民向所有来宾致谢了……”此刻,众挚友和亲朋方明白于右任的苦心。

于右任还将自己、夫人的寿金和孙儿满月周岁所得的礼金悉数捐出救灾,另外还购置粮食一百多石运回三原,在县城设两处饭场救济灾民。

灾荒年间,于右任陆续零星寄钱回乡,每次一千元、一千五百元、二千元不等,让秘书张文生亲手发放,并再三叮咛不许记账。

首创用书法作品竞选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

“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李宗仁。

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凡代表登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2000张照片,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市、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二三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其他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李宗仁给代表提供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副总统竞选者纷纷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唯独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谢绝。他告诉好友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第二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宴请代表,在饭店于右任即席演讲:“我家中没有钱,因此,很难给于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罢了……”

选举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于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人格典范。

首创遗物只有账单

于右任因患牙痛住院,医生劝他换假牙。于右任一算,换六颗假牙需交8000余元台币,而他当时一个月薪金才5000余元台币。因为手中无钱,只好作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

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5月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出院院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5月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作。

1964年8月12日,咽喉发炎病未愈,脚病又加剧。在亲人的再三劝说下又进荣民医院。他叹息:“这里太贵了,我住不起啊!”

同年9月3日,牙痛加剧,不得不再进荣民医院,进行拔牙,牙虽拔了,却因其高烧,转发肺炎,随后病情恶化,即人昏迷状态。于右任的副官沉痛地说:“他老人家如果能早点拔了牙,也不至于多病复发。他的病硬是无钱才给耽误的啊!”

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三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

于右任有一个铁箱子,他对亲友嘱咐:此箱等自己去世后方能打开。1964年10月10日中午,于右任已成弥留状态。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台湾监察院副院长李嗣德,监察委员王文光、刘廷涛、陈肇英等人,当着闻讯而来的记者们的面,打开了这个铁箱子。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没有金银珠宝、股票证券,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除此之外,就是一张张账单借据——于右任三公子于中令这年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和友人借贷的4万元的借款欠条;平日手头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40多年老副官朱子才的账单3万余元。平日,有些人猜想:于右任的铁箱一定藏有珍宝。而今亲眼目睹这些“珍宝”,不由唏嘘呜咽起来,就连平日最爱挑剔的记者们也热泪长流、放声哭泣。当日下午,于右任与世长辞。

次日,台湾报纸赞扬于右任高风亮节、清贫廉洁,大字标题“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 □吴树民

1923年4月,吴佩孚50大寿,康有为特去洛阳祝贺,并献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佩孚本好名,得联大喜,待为上宾。

其时,刘镇华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喜欢接纳名流。刘镇华听说康有为在洛阳为吴佩孚祝寿,于是给康发去电报,欢迎入陕。康有为接到刘的电报后非常高兴,欣然来陕,遍游关中名胜。刘镇华本来就好狐假虎威,康有为受到了高规格接待,除了游览陕西各地外,还到处讲学。在五四运动后新风日盛的背景下,康有为演讲的题目不免显得有些落伍,有人就曾指出,其“所演讲,非隐涉复辟之政治,即非驴非马之科学”。尽管康有为浓重的广东口音令很多听众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他“圣人”的头衔,尽享荣光。

在西安,康有为每到一处均前后拥,随从如云,好不风光。时人甚至认为其“所过之地,不下前清皇帝”。一些崇拜康的人慕名前来求取墨宝,康有为为一一按印,每张收费20元。陕西教育厅长袁延楨求书,忘记付费,把字拿回去一看,见康有为的印赫然倒置,知其故意为之。康有为喜欢文物,也是这方面的鉴定大家。他问刘镇华说:“听说陕西皮货上佳,不知哪家最好?”刘镇华立即派人令西安有名的几家皮货店老板带着自己的皮草来到康有为的住所,供他挑选。康有为留下90多件,让皮货老板找省政府结算。刘镇华说:“康先生准备自己开皮货店吗?”康有为哈哈大笑,说自己就是喜欢,回去把玩而已。

康有为在西安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心情自然十分舒畅,在陕西他走马灯似地进行演讲,易俗会、青年会、孔教会、农会、旅陕粤籍同乡会、万国道德会等,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个遍。康有为登华山后,还给刘镇华写了两首诗:“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嵌刘名与其自



民国陕西督军刘镇华函约馆长大门

号(南海),不露痕迹。下面的人议论纷纷,说康有为拍马屁的功夫炉火纯青,无与伦比。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康有为的西安之旅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天意弄人,11月29日的卧佛寺之行,却使“圣人”变成了“大盗”。

卧佛寺始建于隋,初名福应禅院,北宋太宗时该寺主持惟果终日长卧,人称“卧龙和尚”,遂改称卧佛寺。

11月29日那天,康有为应卧佛寺佛教会之邀,到寺演说,饭后在僧人陪同下游览藏经楼,无意间发现一部明代御赐《磻磻藏经》。该经共分南北二藏,南藏为宋版,北藏为元版,分别在太平天国暴乱和民国初年毁于战火。康有为乃版本鉴定大家,自然知道其中价值。

目睹经书被随意堆放,有些经卷残缺不全已生虫,有些经卷边角竟被僧人剪作鞋垫,痛心之余,康有为不免起了觊觎之心,当下向该寺主持定慧提出购买,声称自己恰好藏有该套经书另外半部,欲合成完璧,存放杭州西湖别墅,以供国人阅览。定慧虽非得道高僧,但如此赤裸裸的交易,显然不能马上答应。或许是意识到金钱购买太过直接,康有

为继而提出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身边的弟子张扶扶眼见其师求经心切,也从旁鼓动劝说。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定慧终于松口,双方随即立下字据。

12月30日,康有为派人通知卧佛寺,声称已经订好经柜,即日前来装运。

康有为“盗经”记

李仪祉的朋友黄健吾有极其珍贵的古钱一枚,有一个姓郑的人借去拿给康有为看,康有为当即拱手称谢:“诚珍物谨谢领矣!”将古钱占为己有。姓郑的一时不知所措,却又不不好意思要回,回去后拿出三十元交给黄健吾,黄道悔莫及。

李仪祉听朋友说康有为在长安县购皮箱数十个,用来运卧佛寺地藏经,认为这是大事,于是询问西安佛教会是否知道此事?佛教会说不知道。

第二天,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麓在学校宴请康有为,邀请李仪祉作陪。李仪祉先到,告诉董校长将于宴间质问康有为易经的事,董雨麓连忙说这个不合适,让李仪祉以后再问。

席间,李仪祉紧挨着康有为而坐,康有为言语不羁,大放厥词,叹三原古建筑之美,说:“此不可不善为保存也。”仪祉说:“先生之言诚是。不特古建筑,古物亦然;不特古物,古书亦然。”康有为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狂谈如故。说:“昔沪上有富豪胡雪岩,卒后,其巨屋以七千两出售,余断其值为他人所得,惜哉惜哉!盖非屋之可贵,而屋中之字画古物,靡不可买,他人得之弗能识,余精鉴别,得其佳者

售之外洋可得巨贯。”仪祉听了觉得很可笑,差点把饭喷出来。他想,这个名扬四海的人,原来是这么市侩之徒啊!

吃完饭,李仪祉写了一封信给康有为,劝其不要欺骗寺僧,巧取豪夺,带走经书。康有为看了李仪祉写的信后勃然大怒,将信直接仍在地上,说:“这件事已成舟,谁敢阻止我?”

当天夜里,康有为使用17辆大车,从中州会馆浩浩荡荡来到了卧佛寺。僧人对康有为

的提前到来十分惊讶,但康不由分说,即令手下士兵开始搬运经书。当时场面十分混乱,不少士兵知该经为稀世珍宝,乱拉乱蹿,竟相藏匿,一些僧人也趁火打劫。装完了宋版和元版的《磻磻藏经》,张扶又令人顺带搬走了清代的两柜经书。

定慧得知此事,忙从寺外赶回,试图加以阻止。许多僧人跪在康有为跟前,要求他留下经书。康有为对定慧师傅说:“汝何虑者,随余之南,大寺院方丈可做也。”定慧说:“僧律全国一致,不能容于陕西,岂能容于他省?”康有为说:“余遣汝出洋,何如?”定慧半天没有说话,眼看着康有为指派的僧人带着经书扬长而去。

搬经当晚,适值《新秦日报》记者在场,第二天即将该事登诸报端。陕西士绅对此十分震惊,纷纷前往卧佛寺询问实情,在得到定慧的肯定答复后,士绅们由怀疑变成了愤怒。不过,考虑到其是督军的座上客,同时也为了保存康有为的尊严,士绅们仍希望和平解决此事。

李仪祉见康有为一意孤行,与杨叔吉、高介人等商人,成立了文物保护协会,并立即呈报警察厅备案。

仪祉等人以文物保护会名义到地检厅控告康有为,要求立即出面拘留康有为,夺回被抢的珍贵文物。康有为闻讯后大发雷霆,骂李仪祉狗咬老鼠,多管闲事!李仪祉不依不饶,康有为恼羞成怒,寻找刘镇华说事。刘镇华早已风闻此事,知道自己引狼入室,于是托病不见。康有为为了几次见不到刘镇华,于是强行带着车马离开了。

地方检察院很快发来传票。不过自恃督军刘镇华撑腰,且认为自己是交换而非偷盗,又立有字据,康有为仍拒不交还,并传出话来:“要打官司,康某愿意奉陪到底,敝人要在大堂上讨个公道,还我清白!”

康有为的傲慢使得围观民众越来越多,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抗议、叫骂声不绝于耳。眼见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刘镇华随即派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中州会馆调解。然而,士绅们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声称,如不还经,绝不放人。

李仪祉见事态紧急,于是给刘镇华出主意,让他挽留康有为迟一天,用心招待,让经书先行一步,以避风头。康有为不知是计,于是就留宿了一晚,李仪祉借此机会带人将经书全部倒换,然后通知刘镇华放人。康有为追上载有经书的车辆后,发现自己被骗,写信质问刘镇华,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二十万元!

由于康有为是名人,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一时成为社会热点新闻。渭南名宿文南赠康有为一副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批:“寿而康”。

一场闹剧至此落下帷幕。对康有为来说,西安之旅是不愉快的,但对这套珍贵的经书来说却是幸运的。正是由于康有为的“盗经”,它开始受到国人关注,1924年由卧佛寺移交给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35年在朱庆澜、叶恭綽、丁福保等人的大力运作下又得以影印出版。

李仪祉成立的文物保护会,开启了我过文物保护的先河。 □高鸿

■往事